

场景参与与村民日常生活实践的政策嵌入*

——基于琼西南小岭村的经验考察

蒋 锐

摘要：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政策传播问题值得关注。本文研究立足本土化经验研究的范式，通过反思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尝试探讨乡村空间的信息流动情形、乡村政策的传播形态、村民的政策感知样貌等议题。本文研究借助常人方法学的“场景—行动”分析视角，通过对琼西南小岭村的实地调查发现，乡村政策在村民日常生活的制度性场景、生成性场景、社交场景、民生与闲暇场景中皆有不同形式的嵌入，而且这种嵌入是常见的，自然发生的，其间政策代理人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动具有显著的局部场景行动的特征。此外，村民对国家的主观想象及其对政策的消极性认同所带来的嵌入缝隙需要给予回应。

关键词：乡村振兴 政策传播 日常生活实践 常人方法学^①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乡村”是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独特场域，它既承载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与每个人都有或近或远的关联，又经受着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诘难，被偏见苛责甚至面临衰败。未来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乡村？如何理解乡村里的人、物、事？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出台了包括《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致力于从国家到地方形成合力聚焦乡村问题。2019年初，海南省从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抽调8000多名干部，按照“一乡镇一队、一行政村一队”的标准，组成覆盖全省196个乡镇、2561个行政村的

*本文研究受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论坛”第96期：“回到‘乡村’：整体性视野与中国社会研究”（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2019年6月27日）启发，初稿《村民如何获知乡村政策：接触惯性与传播缝隙——来自琼西南小岭村的考察》入选“中国新闻史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主办，2019年11月15~18日）。感谢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教师、海南省东方市小岭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王华伟和小岭村“两委”对本文研究的大力支持，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2017级本科生王佳丽、陈佳凤、肖海凤、付鑫、郭希、黄雅慧参与了访谈录音整理。

^①Ethnomethodology的译法有常人方法学、常人方法论、日常生活方法学、民族方法学、民族志方法论、本土方法论、本土方法学等，为避免阅读与理解上的混乱，本文涉及此概念处统一写为“常人方法学”。

乡村振兴工作队，推动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海南大学作为对口帮扶单位，派出多位老师到基层驻村参与一线乡村振兴工作，本文研究以此为契机，得以顺利进行。

海南的乡村发展有其独特的政策环境与特殊的研究价值。自1987年筹备建省之时起，海南就确立了“省直接领导市县的地方行政体制”^①，作为目前“全国唯一在全省范围内实行省直管市县体制的省份”^②，海南县级及以下的行政级别较高，县域经济活力较好，城乡客观区隔相对较小。据海南省人民政府资料，海南现有19个市、县（自治县）由省直管，文中的东方市属于全省5个县级市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是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其相应政策在基层的传播效果如何？作为政策重要关联主体的农民，他们如何感知这些政策？他们能否准确理解并积极参与？研究者在梳理以往农民与乡村政策传播的相关资料时发现，传播效果有限是对农政策落实的难点。曾有媒体报道“农村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可由国家出资治疗”政策在遵义市遭冷遇的现象^③，并指出偏远地区患者知晓率低是影响就医的主要原因。

《农民日报》就此类现象发表评论说：“不少农民对相关政策知之甚少，甚至对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也知之不多，有的村干部也是一问三不知……一些农民不知晓国家的好政策，固然有信息闭塞的原因，也与地方、部门的干部与农民接触少，对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具体、不全面、不到位有关，以致不少强农惠农政策无法原原本本地落实到基层一线，实惠进不了村、入不了户、到不了农民手中。”^④可见，乡村政策与农民时有脱节并非个例，是政策本身不接地气，还是宣传方式方法的问题？抑或农民群体获取信息的能力不尽如人意？

研究者在梳理文献后发现，已有研究尝试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比如徐艳晴、刘富春（2019）就从扶贫政策施行与贫困人群受用的交互关系入手，用多元回归模型对乡镇贫困人群个体差异与旅游精准扶贫政策感知的相关性进行探究，发现贫困人群的个体差异（性别、年龄、利益相关^⑤、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对精准扶贫的政策感知有显著影响。这类研究的特点在于，将政策传播剥离为一项独立的外部刺激，对“政策感知”进行概念操作化^⑥，并在农民群体的人口学特征等方面寻找关联与对应，在确定分析指标的同时，却忽略了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经验的交织与弹性，以及个体境况与其所处

^①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1987年9月26日。参见南海网：<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08/01/25/010196942.shtml>，2021年1月13日。

^②海南省人民政府网：《完善省直管市县体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益》，2014年1月10日，<http://www.hainan.gov.cn/hainan/26022n/201401/38279524d8d7421f935f7371fbc038cf.shtml>。

^③黄宝华：《免费治疗心脏病，热心冷遇？》，《贵阳晚报》，2014年7月29日，第12版。

^④蒋希华：《好政策应让农民知晓》，《农民日报》，2017年8月2日，第3版。

^⑤原文为“利益关系”，是该研究的一个重要变量，指研究对象与扶贫政策是否有利益关联，此处写为“利益相关”更准确。

^⑥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就是将抽象的概念转化成可观察的具体指标的过程，是定量研究过程中的关键步骤之一。参见风笑天，2018：《社会研究方法》（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94，93页。

空间的信息流动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复杂联系。鉴于此，本文研究旨在将政策信息在乡村空间里的流动作为主要关切，既感知村民的信息接触实际，又察觉政府层面的沟通努力与隔阂，进而窥探出乡村政策嵌入村民日常生活实践的可能性，以求厘清更深层次的乡村政策信息流动的内在逻辑。

二、日常生活的场景参与何以可能：常人方法学的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本质上是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一是政策的整体性比较强，会生成大量“政策包”，包含现代农业产业化、生态环境建设、乡风文明、基层乡村治理等诸多板块；二是政策的本地化比较明显，省级、市县再到乡镇村都有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对上级指示的相应理解。这其中，普通村民对政策的感知消化与认可配合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而基于日常生活场景的观察可以深入乡村社会的毛细血管，发现政策与村民的实在关联，是值得尝试的切入视角。

社会学研究对“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关注肇始于胡塞尔晚年在现象学层面的讨论，舒茨(Alfred Schutz)在此基础上开创了现象学社会学(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的基本范式，而常人方法学的创始人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在博士期间去信舒茨，说自己深受其理论启发，正力图通过“系统地破坏”人们用以维持日常行为的“意义结构”来分析普通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然态度与经验(李猛, 1999)。可以说，胡塞尔的思想直接或通过舒茨等人间接地影响了常人方法学的理论取向，常人方法学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则发轫于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分析(李猛, 1999)。

他们三者的区别在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超验的主观的；舒茨强调生活世界是一种历史——社会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文化世界(孙飞宇, 2018)，并把日常世界说成是由意识的心理行为所构成的；加芬克尔则将这种现象学家的心理行为转化为公共的、场景的互动行动(李猛, 1999)。可见，常人方法学注重将分析触角深入到局部位置或场景(local site or setting)中(Melvin Pollner, 2012)，并将任何活动都是“场景性”“局部性的实践”“情景确定的”作为其主要的理论主张之一(李猛,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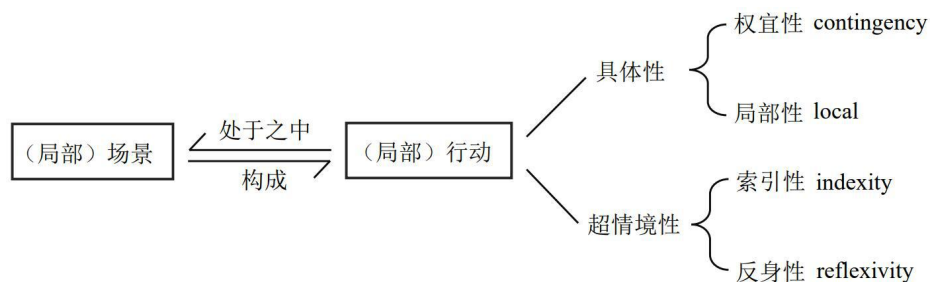


图1 常人方法学视角下的“场景与行动”

注：常人方法学关于日常生活实践行动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行动的权宜性(contingency)，即：行动并非按照事先规定的规则进行，而是行动者根据局部情况与场景条件，依赖自身“永无止境”的努力完成。参见李猛, 1999:《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4页。

资料来源：李化斗, 2011:《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与抽象——兼论“过程—事件分析”》，《社会》第2期；李猛, 1999:《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6-57页。

在加芬克尔的阐释中，每个“场景”（setting）都是一种独特的生活形式^①（Melvin Pollner, 2012），“局部性”的实践行动发生在局部“场景”中。这是因为，行动是在场景中组织而成的，任何社会行动都处于一个场景之中（空间局部的），场景本身也是行动的一部分（结构局部的）（李猛，1999）。

可以看到，各场景中的不同行动可以具体到微观的目标与指向（个体决策、单个事件等），亦可牵连出超情境性的宏观语境（经济基础、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在政策发布落实过程中，既有作为局部与剖面的某个村子，又有村子里某些特定场景的发生与可能。那么，村干部（政策代理人）与村民的互动如何发生？村民之间的互动如何产生影响？这些行动置于乡村生活的何种场景？乡村政策又是如何经由这些行动得以贯彻或受到阻碍？这些就成为本文研究试图回应的问题。

三、考察样本与研究过程

（一）说军话的典型“城中村”

东方市位于海南省西南部，乡村人口密集，约占全市总人口的51.8%^②。小岭村人口约10000余人，根据村委会的社会保障登记摸排，2020年小岭村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为900余人，约为总人口的10%左右，人口结构尚属合理，没有出现大规模人口外流等“空心村”现象；全村面积近38平方公里，是东方市第一大村。村民以种植甜玉米、热带瓜菜为主，以外出务工、运输业和服务业为辅；村域交通便利，离东方市区与海南环线高速公路入口均不到10公里，村中常见在城市打工的外来租户与村民混住的现象，是典型的“城中村”^③。

此外，小岭村还是少有的“军话方言区”^④，整村全部使用“军话”。军话属于汉语中的濒危方言，零星散落在中国南方粤闽琼桂诸省的一些地区，一般都处于强势方言的包围之中，性质近似人们所理解的“方言岛”^⑤（詹伯慧，2008）。军话自古以来就是小众语言，其通用范围及使用人群非常有限。不过，语言的独特反倒加强了使用者的相互认同，表现为群体内部的“抱团意识”很强，这也是小岭

^①原文为：Every setting is a unique form of life.

^②2019年，东方市总人口为43.45万人，乡村人口为22.51万人。参见海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2020：《海南统计年鉴-202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调研发现，小岭村属于“城中村”的理由如下：1. 地处城乡接合部，即城市核心区域的周边或周围；2. 村里的很多农民放弃了第一产业，在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保障城市基本功能的服务业，如保洁、收银、环卫等；3. 村民的文化知识与见识相对于偏远农村较高；4. 小岭村有外来租住人口，许多在城里打工的人在这租房子，村民和外来人口以及城市流动人口混住在一起。

^④唐宋以来，海南都有驻军；到明代更加强了边防战备，大量民丁从西南汉族地区征调至海南，他们大量地留下来化兵为民，繁衍后代，通过数百年发展，形成了今天的军话方言区。参见萧烟、黄珍（整理）：《海南岛的地理形成及各族群的来源分布》，《三亚日报》2016年10月10日，第006版。

^⑤被一种或一种以上的人数较多或覆盖面积较大的方言环绕或包围的小方言可称为方言岛。参见丘学强，2005：《军话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37页。

村民风的一个特点，一方面热情大方重情义，另一方面受固有习俗观念影响较深，随大流从众心态也比较明显。

小岭村的代表性在于，它是典型城中村，地理位置上位于城乡衔接处，文化习俗中有军话村的内生基础，经济结构则是传统农业与新兴服务业兼有。小岭村在城乡的裂缝中有外向连结的一面，也有原生“方言岛”的保守与封闭，其乡村秩序与结构是有弹性和张力的，正如费孝通（1999）在描述江村的代表性时所言：它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

（二）调研实施

运用深入的交谈和参与性观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能发现存在于个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使用其他方法，这些问题则难以发现，也许永远也不会得到注意（华莱士，1984）。鉴于研究主题的实验性与探索性，现有基础性人口统计数据非常有限，研究对象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及其对书面语的理解相应受限等实际情况，研究者采用观察与访谈等实地研究方法，在2019年7月~8月间前往小岭村进行田野调查并面对面深入访谈相关人士，获得了可供分析的谈话素材与田野笔记。

表1 受访者概况（按受访时间排序）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职业	是否本村人	访谈地点
F1	女	30+	村小卖店主	是	小卖店
M1	男	20+	大学生村官	是	村委会与村路边
M2	男	46	农民	是	茶馆
F2	女	48	农民	是	村路边
M3	男	26	农村淘宝店员	是	农村淘宝店
F3	女	40+	村菜市场鱼摊主	是	菜市场
F4	女	40+	村菜市场蔬菜摊主	是	菜市场
M4	男	70+	农民	是	村路边
F5	女	59	农民	是	村卫生室
F6	女	40+	村卫生室医生	是	村卫生室
M5	男	30+	乡村振兴工作队员	否	村委会
M6	男	53	村委会文书	是	村委会
M7	男	69	广播员	是	广播站
F7	女	20+	大学生村官	是	村委会
F8	女	70+	村菜市场玩具摊主	是	菜市场
F9	女	40+	茶馆主	是	茶馆
F10	女	30+	菜市场业主（儿媳）	是	村小卖部
F11	女	30+	农民	否	村小卖部
M8	男	48	乡村振兴工作队员	否	村委会
M9	男	42	村委会副主任	是	村委会

访谈对象涉及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工作队员、村委会干部、村广播员、菜市场业主/摊主、卫生室医生、农村淘宝店员、普通村民等共计2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为15%，无固定收入

者占比 65%，本村人占比 85%，样本结构基本符合小岭村村民的人口学特征，调研内容围绕乡村政策与村民日常生活的勾连展开。

表 2 受访者特征统计分布 (N=20)

性别		年龄 (岁)			收入类别		本村人 占比
男	女	20-39	40-60	60 及以上	固定收入者	无固定收入者	
9 (45%)	11 (55%)	7 (35%)	10 (50%)	3 (15%)	7 (35%)	13 (65%)	17 (85%)

注：“固定收入者”指领取固定工资的受访者，包括大学生村官、村卫生室医生、乡村振兴工作队员、村委会文书、村委会副主任。

四、研究发现

研究选择了五个代表性场景作为切入点来观察小岭村村民的日常生活状态：村头广播是固定时段规律性出现且辐射空间广泛的制度性场景^①，街边、家中、田间的村民都有可能听到；茶馆与卫生室是稳定的物理空间，村民在其间或公开或私人的活动表现出了相应的惯性^②；正在进行整改搬迁的菜市场是一个生成与重建中的场景；线上线下自由切换的手机连接则是具有隐蔽性与偶然性的遍在场景。研究发现，村民政策信息的获取与政治生活的参与大多发生在这些局部场景中。

(一) 村头广播：“正式”的制度性场景

即使被电视、电脑、手机等众多新兴媒体“包围”，广播在农村社会仍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比如播讲时间依照农民生产生活作息，播讲内容具有针对性和本土性，乡音播音也增加亲切感等（韩鸿，2009）。小岭村广播站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播至今，50 多年来从未间断过播音，现有 25 个喇叭分布在全村各处，村里唯一的一位广播员工龄超过 40 年。在大小政策宣讲与公共事务传达等方面，村头广播仍是小岭村首要甚至排它的选项。“像我们宣传一些政策，广播是第一，（这里）基本上每一个交叉路口都有一个广播。”（M1）“村里面都是广播，什么活动节目啊，他就广播。（要不然）怎么通知啊。”（F1）鉴于“日常生活……首先关注的是对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的把握”（李猛，1999），口语化播讲的人情味及其给听众带来的感知共时性使村头广播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典型行动场景。

^①本文研究中的“制度性场景”是长期形成的有共识的规则性或规范性场景。比如，广播在小岭村近 60 年从未间断，且每天的播音时间基本固定，村民在特定时间听广播已成为“未成文的制度”；再者，就目前来看，广播的形态和功能是稳定的，而菜市场、茶馆、卫生室则会随着时代变迁承担不同的功能，这也是广播属于“制度性场景”的表征之一。

^②这里的“惯性”除了指村民的日常生活存在无意识重复的行为，还包含了“老茶馆里都是老人，新茶馆里都是年轻人”以及“卫生室里村医和村民彼此非常了解，不太需要专门沟通”等前述行为习惯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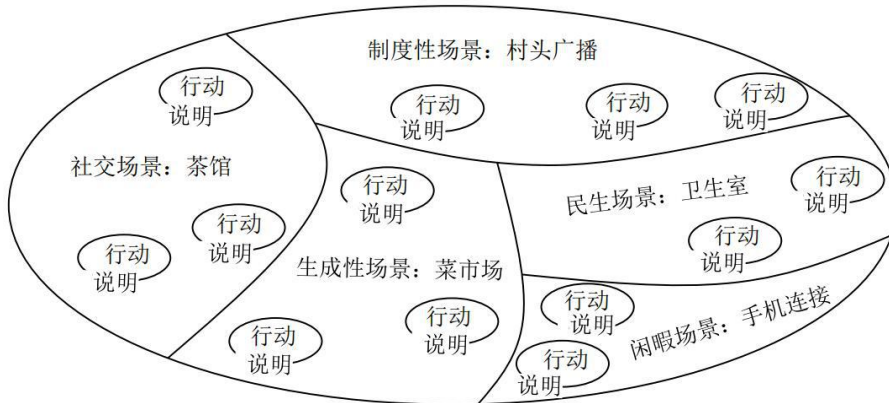


图2 小岭村村民日常生活场景与行动示意图^① (本文研究整理)

1.集体经验的同步与缝隙。根据本雅明的说法，无线电通信用户与小说的孤独读者相比，区别在于其去空间化的但却同步的集体经验（康在镐，2019）。村头广播亦可作相应解读，它在酝酿和输出乡村社会公共性议题的同时，也生产着村民的集体经验。

在小岭村，广播这一局部性场景是有制度可循的，比如它的播讲时间是固定的，“每天都六点钟这样，就开始广播了。”（M7）久而久之，听广播也成了村民的生活习惯，调研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受访者在被问及如何知道村里的事情时，都会提到广播。对小岭村村民而言，听广播犹如本雅明所阐释的那样，既是非沉思的实际记忆的范例，又反过来在公共空间中集体地执行（康在镐，2019）。一旦该集体经验的感知过程受到阻碍，村民们便会对自身的无法参与表示不满，“村子太大了，每个角落都有广播就不可能，（村民就会）反映说有的地方听不到广播。”（M7）

村头广播作为村民生活场景的自然组成，尽管发挥着重要作用，村民也以积极的行动姿态从中获取信息，但诸多传播缝隙限制了广播的政策播讲效果。除了前述的声波不能完全覆盖的情况，还有年长村民因为听力原因需要其他渠道补充等情形：“有些老人（耳朵不好）听不到（政策通知），他就出来喝茶的时候，人家跟他说的”（M1）。此外，研究者在调研中还了解到村民对广播的许多质疑：“就靠这个（喇叭）广播一下（政策），他（指村民们）也不一定听得清楚，最起码你（指村委会）（要）有一些（其他）东西（指广播以外的宣传方式和手段），因为农村很多人不读书。”（M2）“广播宣传的媒介当然好，因为它可以让大家了解，但是了解完以后怎么样……他如果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即使你告诉他，也是无效的选择，也是无效的广播……稍微懂点字的，他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接不接受是另外一件事。”（M5）

这些情形会导致村头广播的尴尬处境：有的人听到且听懂了，有的人没听或听不到，还有的人虽然听了但并不理解与接受……可见，并非固定的制度性场景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导向社会成员的认同与行动，村民的反馈本身也在解构着这一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这也是常人方法学中所阐释的行动反身

^①严格来说，场景与行动是没有边界的，此处为了方便说明采用圆形图样。常人方法学的观点认为，场景与行动的“边界”取决于研究者索引的范围，但索引性“永无尽头”，其真正的用处在于使行动成为可说明的（李猛，1999）。

性的核心特征：即可解释的实践行动与局部情境是相互塑造的^①（Alec Mchoul, 1998）。

2. 日常生活的政治维度。政治问题是日常生活转向^②的核心议题之一，日常生活的政治以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人们显示了日常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政治意义，它不仅是广泛意义上的各种利益群体相互博弈的社会时空，还是阶级或国家统治的基础（郑震，2016）。在小岭村广播员的眼里，广播站俨然是一个“政府、政策代理人”的角色，“广播站应该是按照上面的指示，（把）国家的重要事情通过扩音器放出去……共产党的政策都需要宣传，村里的工作部署也要通过广播传达。”（M7）

政策信息多源自纸质文本，当这些宏观、抽象、延展性极强的书面表述在小岭村广播站进行口语转化时，难免会产生“人们说话的地方位于文字事业之外，口头表达在生产陈述体系的地方之外”（米歇尔·德·塞托，2015）的隔阂与偏移。也许是为了调和这种偏移，军话和普通话在小岭村的广播里出现了自发的分工，“（广播大多数时候）说军话，有时候是普通话，（普通话用来）说市里面有些事（指上级政策通知或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等）。普通话表达不出来（说不清楚）的，只能用军话去表达，这个是怕别人听不懂，（主要）怕那些老人听不懂。”（M1）可以看出，普通话在广播中对应的是“市里的大事”，但也有普通话让村民费解的时候，于是军话广播一方面确保了信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成为强化村民在地认同的一个渠道。在新兴媒体冲击下的今天，普通话使用的政治意涵与地方方言的默认在场成为小岭村村民仍旧青睐广播的超情境性原因，即：“当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及强势的全球化媒体的力量，使得全世界都臣服于一种文化同质性的状况下，语言，作为文化的最直接表现，也就成为文化抗拒的战壕、自我控制的最后堡垒，以及可以确认意义的避难所”（曼纽尔·卡斯特，2003）。

由此可见，村头广播作为小岭村政策传播的主要渠道，具有鲜明的公共性特征。嵌入日常生活的“广播宣讲”促成了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其传达的政策信息与公共议题代表着某种“共同关心”（inter-est^③），存在于人们之间，并把人们联系和约束在一起（汉娜·阿伦特，2009）。

（二）菜市场：经济生活的生成性场景

菜市场是小岭村重要的商品交易与村民集散地，它是日常生活的必要场景，凭借其独特的组织方式介入当地人的生活，消费、交易、人情、身份等在此展现。

1. 秩序的再生产。秩序问题是常人方法学的核心问题（李猛，1999），一个地点就是一种秩序，根据这一秩序，各个组成部分被安排到共存的关系之中（米歇尔·德·塞托，2015）。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并将“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作为主攻方向。本文研究进行过程中，恰逢小岭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为落实此项政策对以往脏乱差的村菜市场进行整改搬迁，并将菜市场改造工作写入《小岭村乡

^①原文是：the mutual constitutivity of accounting practices and the local situations they account for.

^②日常生活转向：西方社会学的主流话语曾长期由实证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主导，这一状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根本动摇，日常生活的社会学视角便是这一时期推动西方社会学主流立场转向的一股重要力量。参见郑震，2016：《日常生活的社会学》，《人文杂志》第5期。

^③原书中inter-est的索引是interests，源自拉丁语词interesse，连字符是强调inter（在……之间）与est/esse（存在/是）的含义。

乡村振兴工作方案》(下文简称《工作方案》):“针对村内最棘手的菜市场环境污染问题,虽经过村委划线和分档管理,环境问题有一定改善,但因市场经营者基础设施未进行整体整改,仍无法解决污水横流、异味扑鼻、交通阻塞、声音嘈杂的问题。现已通知两个菜市场经营者(2019年)5月15日前进行市场整体改造,改造期间商户搬迁至新建的市场经营,改造完成后再自主决定是否返回村内经营。”

小岭村有两个菜市场,分别有50多个和30多个摊位,用以满足全村万余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当乡村振兴工作队着手菜市场的全面优化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说服与互动创建一个新秩序,这一过程伴随着角色各异的菜市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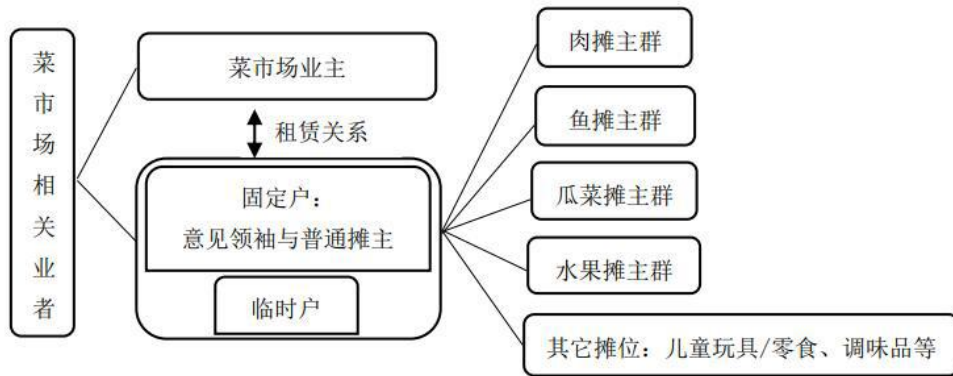


图3 小岭村菜市场相关业者结构(本文研究整理)

由上图可知,一方面,业主和固定户中的意见领袖是工作队需要重点说服的对象:有的摊主是业主,又是当地大户,多重身份的加持使他们更像菜市场里的权威;还有固定户中的意见领袖,他们在各自的小圈子有影响力,“你(得)找一个带头人跟他说,别人都搬了你为什么不搬,比如说典型的卖肉的,卖鱼的,卖菜的。”(M1)另一方面,尽管《工作方案》给出了明确的整改时间点,但面对那些流动性强的临时户,工作队的行动策略体现出日常生活实践的权宜性特征,会兼顾到熟人社会的乡里乡情,“你看这些阿婆啊,她自己种的就拿来卖的那种,她不是经常来,不是固定户。我们只能跟她说,放到旁边一点去卖,因为老人了……她们也不会去(临时的周转地),太远了,路程很长去不了。”(M1)

在菜市场整改搬迁的行动网络内部,有群体也有个体,有合作也有冲突。起初听到菜市场整改的消息时,业主与摊贩就有一致的诉求:不愿意周转动迁,不愿意清理卫生等;后来当业主打算借此上调租金时,摊贩们却不愿意配合。除此之外,还有工作队沟通方式的适时调整与村民不同意见的协调反馈,整个过程既要符合政策要求,又要考虑村民的实际承受能力以及乡土人情。可以说,小岭村菜市场的整改搬迁是在乡村政策落实与在地化双重压力下的秩序再生产实践。

2.寻找“共识”的说服。政策通常出于公共利益,个体难免会与其产生矛盾,尤其对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受既定认知方式影响较深的村民来说,他们可能更难克服与超越现有立场。“像我们村的话说起来是很好管理的,但是有可能文化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因为读书的人少的话,他认识可能比较浅一点。”(M2)这一现实会使政策公共性与个体立场的角力越发明显,导致政策在农村推行的阻力增大,“做事(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话不反对就不错了,我们(指乡村振兴工作队)觉得是好事,他们

（指村民）认为是胡搞。”（M5）这进一步说明，个人意识的封闭性决定了所谓的“共同理解”本质上是个人的自我判断，并且始终是暂时的，随时有遇到反面证据的可能（李化斗，2018）。

对当地村民来说，口头告诉他们具体的做法会比用宣传板写文字更有效，也更直接。“（讲乡村振兴）年轻一点的听得懂，但是老一点的听不懂，我们只能好好跟他说；就说具体一点的，简单的，他能做的你就跟他说，（如果）说大了，整个乡村振兴他也不知道啊！”（M1）如果说存在某种作为起点的“共识”的话，那就是双方都会假定对方是理性的或者说对方会遵循这个场合下“恰当”的规则（Garfinkel, 1984）^①。虽然这种“规则”的内容会因个体差异导致理解不同，但这不妨碍互动能够有序地进行，并且互动双方都认为“理解”了对方（李化斗，2018）。这一“理解”并非一蹴而就，“刚开始要我们（指菜市场摊贩）去那边（指菜市场搬迁过程中的周转地），我们也是反对的。”（F4）村民的不理解、不配合时常出现，“刚开始比较抵制，他不明白你到底做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就以为你不给（让）他卖了。比如说长期卖菜的那些商户，（他会觉得）断了他的生活经济来源啊，（当时）铺水泥路的时候，（要）把路全都封掉，回家都成问题，那他就反对了：我连家都不能回啊！怎么怎么的。”（M1）这些质疑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双方互动的基础与干部落实政策的积极性，但村民也能够在看到实际效果之后重审规则与新建秩序，最终达成真正的理解与共识，“（菜市场整改了之后）肯定好一点啊，市场（还）是一样的，（但变得）比较干净吧。”（F3）

根据 Watzlawick, Bavelas & Jackson 在 1967 年提出的关系传播原理：任何一次谈话——无论长短——都包含了两个信息，即内容信息和关系信息（李特约翰，2004）。菜市场整改过程中的说服既有政策性内容，又包含了相应关系。“我们（指村干部）每天都在这里走，跟他们（指菜市场摊主）宣传，（让他们）尽量不要妨碍大家交通，不停地去沟通，他有些能听你的，有些不听你的，你要反反复复跟他说。”（M1）内容层面的传达之外，原有关系的试探与强化显得重要且隐蔽，政策宣播者与村民之间既有上情下达的结构化对应，又有乡里乡亲的复杂人情，关系的确认表现为不断地试探直至配合执行。

菜市场是村民日常生活的发生场景，较之村头广播的相对稳定，它具有时代性与变化性，毕竟，村民经济生活的内容和方式需要与时俱进。从小岭村菜市场的整改搬迁可以看出，乡村政策的落实会与其利益相关者发生非常直接的交锋，交锋的实质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矛盾，摊贩与村民的日常买卖活动在乡村振兴工作队推动菜市场搬迁时成为政策评估的依据和内容。随着乡村振兴各项政策的不断实施，不排除未来将有类似的“改造既有场景”事件再次发生，甚至成为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岭村菜市场的整改搬迁提供了一种参照，即政策嵌入村民日常生活中那些亟待重建再造的场景的可能性。

（三）“老爸茶”^②馆：本地化的社交场景

^①Garfinkel, H., 1984,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转引自李化斗，2018：《本土方法学的本体论及对社会学的意义——基于对加芬克尔著作的解读》，《青年研究》第4期。

^②海南民间把大众茶称作老爸茶，先前这些大众茶几毛钱一壶，配些小点心，经济实惠，老人们借此聊天解闷；海南民间称上年纪的人为“老爸”，故这种大众茶就称作老爸茶。后来年轻人也经常出入其间。参见：《海南省志·民俗志》，海南史志网，www.hmszw.org.cn，2019年8月10日。

在常人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 的界定中, 加芬克尔使用 “ethno” 对群体独特性、秩序局部/本土 (local) 性、互动情境性加以强调……该词在实际使用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对 “局部性” 或 “本土性” 的强调最终占据了上风 (李化斗, 2018)。作为传统中国社会中为数不多的社交机制 (institutions of sociality), 茶馆不仅是各地饮食习俗和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是凝聚传统社会基层组织、经济交往和权力结构的重要场所 (宋靖野, 2019), 是在地知识流动与本地风俗浸润的纽带与节点。

1. 作为 “成员” 的成年男性。小岭村有大大小小 5 处 “老爸茶” 馆, 茶馆集会是熟人社会的自发行为, 茶馆是非常鲜明的成年男性活动空间, 喝茶、聊天、看电视、打牌, 几乎看不到女人的身影。费孝通 (2012) 在《江村经济》里也描写了类似场景: “男人们利用这段时间 (原文指农业劳动和蚕丝业劳动的间歇) 在茶馆里消遣。茶馆在镇里。它聚集了从各村来的人。在茶馆谈生意, 商议婚姻大事, 调解纠纷等等。但茶馆基本上是男人的俱乐部。”

作为农村社会的主要劳动力与家庭经济支柱, 小岭村的成年男性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秩序中, 而且内化了特定的抽象规范, 成为了该社会的 “成员”, 亦即现实中的行动者 (李化斗, 2011)。在茶馆里, 他们是寻求资源者, 是交换信息者, 也是纯粹打发时间的旁观者……行动无论其特定内容是什么, 总是建立着关系, 从而内在地具有冲破所有限制和跨越所有界限的倾向 (汉娜·阿伦特, 2009)。研究者在茶馆中听到过集体土地分配、房屋拆迁、收成收入、社保医保等各类政策性话题, “由头” 通常是某个村民先讲述个人或亲戚的遭遇, 而后加入讨论的人越来越多, 逐渐形成一个临时的话题小组。这些话题通常很难马上形成定论, 甚至许多会被反复议论, 比如当研究者询问某些细节时, 会有不同的村民上前补充, 说明大家已经对此很熟悉, 而且讨论过程伴随较强的主观性。

由此可见, 小岭村的茶馆一方面排解疏通着作为重要社会 “行动者” 的成年男性村民在政治生活上的困惑, 另一方面也指向了行动者的不可预见性, 即: “无论它在私人还是公共生活中被讲述, 无论它涉及的行动者是多还是少, 它的充分意义都只有在结尾的时候才透露出来” (汉娜·阿伦特, 2009)。因而, 通过茶馆这样的日常社交场景去感知政策嵌入的潜流以及公共事务的舆情是非常必要的。

调研还发现, 小岭村的各个茶馆存在鲜明的 “年龄差”, 即: 开业时间最长的两个茶馆顾客最老, 全是 60 岁和 70 岁以上的老人, 年轻的茶馆顾客更年轻, 茶馆这一社交场景中的人们有着更为接近的生活履历与经验储备。正如加芬克尔所阐述的那样, 成为一名合格 “成员” 的关键是对日常生活抱有与他人相同的 “背景期待” 或 “对社会结构的常识知识” (Garfinkel, 1984)^①, 这一情形也使得茶馆中的社交联系更加紧密, 在议事时更容易达成共识并输出集体性情绪。

2. 政策议题与本地知识。在日常生活中, 所有的经验和行为都基于关联结构 (Alfred Schutz, and Thomas Luckmann, 1973-1989)^②, 这里所谓的关联, 就是指在一个情境中, 什么问题会成为人们关

^① Garfinkel, H., 1984,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转引自李化斗, 2018: 《本土方法学的本体论及对社会学的意义——基于对加芬克尔著作的解读》, 《青年研究》第 4 期。

^② Alfred Schutz, and Thomas Luckmann, 1973-1989 (2 vols.),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转引自李猛, 1999: 《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 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注的焦点、考虑的主题 (theme), 人们会对什么问题感兴趣 (李猛, 1999)。茶馆占据了小岭村成年男性大部分的休闲时间, 农闲时几乎每天都是满座, “我们村 (民) 一过季节 (指玉米种植季)^① 就是这样子 (泡茶馆) ……平时能搞生意就搞搞生意, 没有生意就出来喝老爸茶。” (M2) 茶馆里聊天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的, “什么都聊, (聊) 村里的事, 聊种玉米, 也聊女人 ……” (F9)

研究者走访了小岭村的多个茶馆, 当说明来意后, 受访者无一例外非常热情地介绍当地政策实施情况, 好像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想法要表达, 比如土地承包、产业规划等, 并表示想让研究者待久一点了解深入一点, “我希望你们来我们村实践 ……你们在我们村停, 了解情况的时间 (应该长一些), 这些东西需要你们去了解”。(M2) 可以看出, 在茶馆里讨论政策议题是小岭村民热衷并且擅长的, “茶馆 (议事) 讲理” 这个实践显示了乡民的相对自治状态 (王笛, 2018)。这个乡村社会特有的社交场景让村民可以放心地主动地参与政治生活, 熟人社会的知根知底也使茶馆里的村民得以保持着一贯的个性, “它是人们能够显示他们真正是谁、不可替代的地方 ……出于对这样一种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显示自己的政治体的热爱, 每个人才多多少少地愿意分担审判、辩护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 (汉娜·阿伦特, 2009)。

(四) 卫生室: 处于 “中间层” 的民生场景

小岭村有 1 个村级卫生室, 为全体村民提供医疗服务。相较于官方性质的广播和民间气质的茶馆, 村卫生室更像一个 “中间层” (mesosphere), 既要保证有关医疗保障的国家政策的宣传落实, 又要时时与普通村民打交道, 因而村卫生室可以视为国家政策与村民连通的实体空间。

1. 在微观互动中形成合意。常人方法学主要关心的不是规范和价值的由来, 而是人们相互作用和相互证明自己是按规范和价值行事的过程 (华莱士, 1984)。调研中发现, 医疗政策在村民就医过程中的嵌入基于村医与村民的深度互动。

医疗工作的性质使村医和村民有长时间的面对面接触机会, 比如在卫生室输液的村民会在此停留很久; 此外村医通常是当地人, 对辖区内村民的个人情况和身体状况都比较熟悉, 比如访谈中进来一位女病人, 村医看了一眼马上介绍说: “她是我们村里的人, 她好像是有高血糖的。” (F6) 调研期间正赶上国家卫健委 “心血管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 的惠民政策在小岭村实施, 卫生室门口张贴了红底黄字的海报, 问到那些不识字的或者看不到海报的村民怎么通知时, 村医说: “(先) 一个一个打电话, 大部分都是家家户户去的, 或者我们这些人到村子里面去 ……有一些老人不懂看 (指不识字而且行动不便), 你要 (把宣传资料) 给他拿回去, 要跟他讲, (但是) 他听不完那么多, 你读太多的话, (他会) 有些烦了, 就大概有几个要点跟他说一下。” (F6) 这类互动合意固然成本颇高, 不仅需要反复沟通, 还附着了大量前期铺垫工作, 但这是基于小岭村客观条件的现实选择。对当地村民来说, 村医既是专业上的权威, 又是一个交往已久的熟人, 村医的一对一沟通显然比文字的、单向的宣传更容易接受。

2. 国家政策作为抽象索引。国家可以视为一个 “超级个体”, 它不同于一般个体, 具有抽象性, 即: 它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社会成员的想象中, 并且其被想象的方式也正是其发挥影响力的方式 ……成员对 “国家” 的想象正是一种抽象索引, 一种行动的预设, 要充分说明行动, 理应首先说明这种预设的

^①小岭村种植的农作物以玉米为主, 玉米种植季为农历 9 月份到下一年的农历 1 月份左右。

存在（李化斗，2011）。研究者在村卫生室遇到多个前来看病的村民，问及是否可以向其了解情况时，有村民问：“我汇报给你广播记者，是不是会有（政策）照顾一点的？”（F5）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者此前并没有介绍职业，“广播记者”的身份以及“汇报给广播记者就可能会得到政策照顾”存在于村民的想象之中，这一想象暗示了村民自以为的与国家政策连接的方式，也是村民行动的抽象索引。

以本体论的视角来看，每一案例所包含的现象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抽象索引、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具体索引。三者之中，抽象索引是基础，决定了行动者发挥能动性的方向以及具体索引的最终建立（李化斗，2011），国家政策对村民来说终究是抽象的，但对其的想象决定了村民如何采取行动。调研中遇到一位因未满足60岁暂不能享受特殊优惠的村民，尽管村医一再解释，她仍觉得自己应得的红利被隐瞒了，“我们这些农民，不知道这个政策有什么好办法来帮助我们，不知道国家有什么好办法来帮助我们……我们哪里知道有这个事情。”（F5）可以看出，村民对“政策”本身的索引是正面的，是他们想要获知与争取的“资源”，但对政策的落实与自身的行动能力却持有怀疑，这种情形再次印证了重视国家政策与普通村民连接的迫切性。

（五）手机连接：随时随地的闲暇场景

信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领域和舞台，即互联网公共空间，一旦这个空间被创设出来，国家就无法不受到这个新领域的限制（郑永年，2014）。截至2020年6月，中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过半，达到52.3%，增长速度与幅度明显高于城镇互联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0）。因便捷、经济、操作容易，手机是农村网民上网的首选设备，相较于其他终端，手机使用率的城乡差距最小。截至2015年12月，农村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87.1%，仅低于城镇网民4.1个百分点，而其使用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则分别低于城镇网民18.3个和16.2个百分点（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

和中国的许多农村一样，小岭村不存在互联网接入的问题，WIFI已经实现低成本覆盖，村民对手机完全不陌生，甚至可以说非常熟悉。无论村口、路边还是小卖部，站着或坐着低头看手机的大有人在，农村淘宝店的仓库每天有大量快递包裹进出，网络购物在村民中很流行，年长的人也会让年轻人帮忙网络购物。可见，区别于前述广播、菜市场、茶馆、卫生室的时空稳定性，经由手机连接抵达的屏幕世界形塑了小岭村民的闲暇场景，这一场景是散点的、虚拟的、隐蔽的与极度个人化的。

1.超越乡约社会的纯粹实践。马克思曾将休闲时间与工作时间中的人表述为“两个分离的主体”：一是休闲时间的自由主体；二是生产过程中的纪律约束主体。两者的矛盾势必表现为自由主体对集体约束主体的消解（周怡，2005）。村民的生产活动如干农活、打零工等通常不会有特别严格的纪律约束，因而他们的工作与闲暇很多时候是混淆或者相互切换的。走访中发现村小卖部的店主一边看手机一边照顾生意，“（平时用手机）看抖音啊，看有意思的事，就是一些搞笑的视频。电视剧一般我都很少看，太忙了，没时间看那个。你看了老是想着要看，可是还有好多工（活）要做，所以就不看了。”（F1）

纯粹实践是剥夺了个人生活史语境的生命瞬间，既非实用价值，又非交换价值……它能使“这个共有的社会实体构成的结晶”没入情境之中（吉奥乔·阿甘本，2015）。较之前述四种场景，手机连接既不像村头广播那样对村民有较强的号召力，又不像菜市场那样能够组织起村民的日常经济活动，更没有茶馆里的社会声望与乡土人情，但它可以使村民在虚拟的闲暇场景中释放渴望，获得所感取得所

需，并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调研发现，许多村民关注了“东方公安”“东方交警”等政府部门的微信公众号，并能够对上面最新发布的信息进行复述评价，这说明通过手机连接实现政策嵌入是可能且可行的。

2. 基层治理的行动力。互联网在一个特定的政治—制度环境中运作，互联网如何影响公民参与，取决于互联网和当前政治—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郑永年，2014）。除了普通村民，手机连接也发生在村委会与上级政府的沟通中，村委会定期将村务动态制作成“美篇”^①提交给上级，“（镇里）那边收集汇总，如果领导需要他会用，不需要他就一直留。”（M1）“美篇”会展示大量村民日常生活以及村务活动，上级政府将此作为评估政策落实情况的依据之一。可以说，手机作为通讯设备与连接手段进入乡村社会基层治理渐成常态。

依照汉娜·阿伦特（2009）提出的“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可以判断，小岭村的广播和茶馆无疑是公共性的，它们承载着村民对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政策在其中的嵌入亦有公共讨论的特征；菜市场的经济行为与卫生室的就医行为则具有不完全意义上的弱公共性，毕竟这其中的财务状况隐私与个体病痛并不能够被所有人看到或听到，这些场景中的政策嵌入针对性更强，互动沟通与落实过程的成本也更高；此外，手机连接的闲暇场景是弱私人性的，尽管个人化与隐蔽性是其典型特征，但其潜在的社会动员能力不容忽视，“在中国，互联网使得社会群体发展了社会资本，从而推动了公民参与”（郑永年，2014），手机连接很有可能成为村民未来参与政治生活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场景。

五、余论与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政策传播过程中存在着隐性的消极认同现象，即：尽管最终合意了，也落实到位了，但不排除有一些人是迫于群体压力。尚燕等（2018）研究指出，农民群体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行为举止相对因循守旧，缺乏变通，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容易接受大众规范，甚至人云亦云。此外，农村崇尚邻里友好，互帮互助，群体归属意识较强，因而很多时候村民的决策并非是其个体独立思考的结果。再者，一些村民囿于自身身份与困于表达也采取了消极应对的方式，“（有村民觉得）我就是个农民，不能再怎么样了。”（M5）就像汉娜·阿伦特（2009）所形容的那样：“高速的经济进程是由人的行动发动的，而与此相关的人却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看作社会经济大潮中无助的随波逐流者”，一些村民亦把自己当作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随波逐流者”，长远看来，这可能会成为消解乡村政策指导价值与实施效果的暗流。

信息流动与社会交往宛如乡村社会结构中的黏液与润滑剂，它和村民的参与感、获得感有关。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政策的密集发布与状况迥异的村庄的调适探索是值得长期关注的话题，大到国家政策，小到村委会通知，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生活的影响。在相对稳定的旧有乡土社会结构与秩序中，本文研究通过对小岭村的观察发现，乡村政策在村民生活的制度性场景、生成性场景、社交场景、民生与闲暇场景皆有不同形式的嵌入，而且这种嵌入是常见的，

^①一款图文创作 APP，用其制作编辑的每篇文章可包含上百张图片与文字说明，可在微信平台上转发分享。

自然发生的，其间政策代理人、村民，以及村民之间的互动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局部场景行动的特征，即权宜的、本地化的、索引的以及反身性的。与此同时，本文研究亦发现了嵌入之外的空间与缝隙，比如村民对国家及国家政策的主观想象带来的政策落实的阻力等。

诚然，本文研究还有许多有待拓展的地方：比如可以尝试特定政策特定传播方式的效果量化研究，进而提出策略性建议；也可以把不同村庄的研究整合起来，寻找乡村政策与村民连接的更多共性与特殊性。本文研究的初衷是想通过挖掘乡村经验来践行本土化研究，但当觉察到村民最关心的其实是土地与生计时，研究过程也常常被学科的无力感与自我怀疑所包围，学术研究能够在乡村中有何作为？什么样的议题在乡村研究中是有价值的？或许，乡村社会的历史性、经验性和开放性提醒研究者：应该承认本学科内部与外部的共通性以及多重理论层次的共鸣，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与其它学科的深入对话与合作。保持对人的关注，才是社会科学研究不变的命题。

参考文献

- 1.[法]米歇尔·德·塞托，2015：《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2.费孝通，1999：《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 3.费孝通，2012：《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4.风笑天，2018：《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5.海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2020：《海南统计年鉴-202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6.韩鸿，2009：《参与式传播对中国乡村广播发展的启示——基于四川古蔺县桂香村“夫妻广播”的调查》，《当代传播》第2期。
- 7.[韩]康在镐（Jaeho Kang），2019：《本雅明论媒介》，孙一洲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8.李化斗，2011：《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与抽象——兼论“过程—事件分析”》，《社会》第2期。
- 9.李化斗，2018：《本土方法学的本体论及对社会学的意义——基于对加芬克尔著作的解读》，《青年研究》第4期。
- 10.李猛，1999：《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1.李特约翰（Littlejohn, S. W.），2004：《人类传播理论（第7版）》，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12.曼纽尔·卡斯特，2003：《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3.[美]汉娜·阿伦特，2009：《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14.[美]华莱士（Ruth Wallace），1984：《加芬克尔及其民族方法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第3期。
- 15.丘学强，2005：《军话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6.尚燕、颜廷武、张童朝、张俊飏，2018：《从众意识对农民秸秆焚烧危害认知的影响——基于鲁、鄂两省的农民调查》，《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2期。
- 17.宋靖野，2019：《“公共空间”的社会诗学——茶馆与川南的乡村生活》，《社会学研究》第3期。
- 18.孙飞宇，2018：《方法论与生活世界》，北京：三联书店。
- 19.王笛，2018：《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徐艳晴、刘富春, 2019:《政策感知、个性差异与旅游扶贫精准化——基于海南的实证分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 21.[意]吉奥乔·阿甘本, 2015:《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 22.詹伯慧, 2008:《濒危方言的研究大有可为——评丘学强<军话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23.周怡, 2005:《共同体整合的制度环境:惯习与村规民约——H村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 2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16:《2015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 2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20:《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26.郑永年, 2014:《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邱道隆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 27.郑震, 2016:《日常生活的社会学》,《人文杂志》第5期。
- 28.Alec, M., 1998, "How can Ethnomethodology be Heideggerian?", *Human Studies*, 21: 13-26.
- 29.Alfred Schutz, and Thomas Luckmann, 1973-1989 (2 vols.),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30.Melvin, P., 2012, "The End(s) of Ethnomethodology", *American Sociologist*, 43:7-20.
- 31.Garfinkel, H., 1984,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小 秦)

Engagement in the Settings and Policy Embeddedness in Peasants' Everyday Life: An Investigation from Xiaoling Village of Southwest Hainan

JIANG Rui

Abstract: The policy commun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noteworthy issue for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paradigm of localization,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spond to the confusion of information flow in rural space, modes of rural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 perception of peasants by reflecting on their everyday life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tting-action" analysis of ethno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of Xiaoling village in southwest Hainan, the study finds that rural policy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constructing setting, social setting, livelihood and leisure setting of peasants' everyday life, and this kind of embeddedness is common and natural. What's m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cy agents and peasants, as well as between peasants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setting-action. In addition, the gap of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caused by the phenomenon of peasants' subjective imagin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ir negativ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olicy should be noted.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Communication; Engagement in Everyday Life Setting; Ethnomethodology